

“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

——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追记

□ 李庆刚

4月24日是“中国航天日”，也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50周年纪念日。50年前的今天，即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东方红》乐曲响彻寰宇。“东方红一号”的成功发射，开创了中国航天史的新纪元，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地位。

“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是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成就，引起世界轰动，也引发了中国人对卫星的极大关注。一个月后的11月3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典礼时特别指出，这一事件表明“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

苏联发射第一颗卫星后，应苏联科学院要求，中国科学院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苏联卫星的观测。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借鉴机会，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等向中央建议，借此开展中国自己的卫星研究工作。

对于科学家们的建议，党中央、毛泽东高度重视。1957年12月，在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毛泽东提出：“再过十年八，卫星、火箭都可以造。”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正值苏联第三颗卫星成功发射，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这一讲话，吹响了中国人进军宇宙太空的号角。

随后，在周恩来和负责科技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直接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为副组长的“中国科学院581组”。“581”，就是把研制人造地球卫星列为1958年第一项重点任务的代号。1958年10月，赵九章等科学家组团到苏联考察，通过对比分析，他们认识到发射人造卫星是一项技术复杂、综合性很强的大工程，建议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先从火箭探空做起。

10月27日，毛泽东专程到中国科学院参观自然科学成果展览会，展览会展出了卫星和火箭的设计图和模型。毛

泽东边走边看，鼓励陪同的钱学森说：“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同年11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向中央汇报了研制卫星的计划，得到批准，中央决定拨2亿元专款予以支持。研制卫星，事关重大，引发了毛泽东的深邃思考。1958年12月，他挥笔写下一首《七绝·试仿陆游韵〈示儿〉》：人类今嫫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貔貅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要从8公里到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上去”

有了资金支持，研制卫星还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好高骛远。中国科学院提出“以探空火箭练兵，高空物理探测打基础，不断探索卫星发展方向”的发展步骤。

缩短战线后，研制团队很快在探空火箭研制方面有了突破性进展。1960年2月19日，我国试验型液体探空火箭首次发射成功。4月13日，毛泽东在北京钓鱼台召开的会议上说：“实力政策、实力地位，在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他提出，十年卫星上天，“人家能做到的你也应该做到，人能也，我亦能也。外国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5月28日，在上海视察期间，毛泽东专门到文艺会堂参观科学技术成果展览，看到了刚刚发射成功的探空火箭模型。当得知火箭的射程高度为8公里时，毛泽东说：“不算太低，亦不算高。”他鼓励科研人员：“要从8公里到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上去。”

经过改进，1961年11月，我国探空火箭达到58公里的高度。在此前后，苏联的技术进步很快：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坐飞船首次飞行太空成功；1962年8月11日、12日，苏联连续发射载人卫星式宇宙飞船，并成功在太空作编队飞行。1962年8月15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联名致电苏联领导人表示祝贺。

在空间科学技术方面，中国不能只做旁观者。1962年底，周恩来领导制定《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时，强调要加强“星际航行”“人造天体”方面的研究。经过努力，1963年12月，我国探空火箭发射高度达到115公里，有效载荷40公斤。1964年6月，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发射成功；10月，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成绩催人奋进。1965年初，赵九章、钱学森先后向中央建议，将研制和发射卫星提上日程。周恩来、聂荣臻表示赞同，并委托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邀请专家进行论证。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1965年8月，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原则批准《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建议》。计划在1970年至1971年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名为“东方红一号”，并在卫星上播放《东方红》乐曲，要求“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做到一次成功，初战必胜。人造地球卫星工程的代号由“581”任务变更为“651”任务，卫星进入全面研制阶段。

为保证卫星研制不受干扰，1967年3月、10月，毛泽东先后批准周恩来、聂荣臻的报告，把分散在各部门的卫星研制力量集中起来，把国防科研单位调整编组为若干研究院。1968年2月，中国科学院把卫星工程及主要承担卫星工程任务的单位全部移交国防科委，建立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兼任院长。广大科技人员、干部职工和解放军指战员，迎难而上，埋头苦干，攻克了设计、研制、生产、加工、试验等方面的上百项关键技术，保证了卫星的研制进度。

“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十年磨一剑。1970年春，“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装完毕，于1970年4月1日运抵酒泉卫星发射场。4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从发射场返京的钱学森、李福泽等人的汇报，批准卫星和火箭进入发射工作位置。4月20日，周恩来发出指示：第一颗卫星的发射要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要求参试人员“认真地、仔

细地、一丝不苟、一个螺丝钉都不放过地”进行测试检查。在完成测试检查并解决所有问题后，周恩来将有关准备工作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批准24日夜间发射。

历史的指针终于指向了这一刻——1970年4月24日晚21点35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随“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徐徐升空。21时48分，星箭分离，卫星入轨。21时50分，中央广播事业局报告，收到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清晰洪亮。在审批完卫星发射的新闻公报后，如释重负的周恩来飞往广州，参加4月25日由越南、越南南方、老挝、柬埔寨领导人召开的“三国四方”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自豪地宣布：“为了庆祝你们这次会议的成功，我献来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就是：昨天晚上我们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

4月25日，新华社受权向全世界宣布：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运行轨道的近地点高度439公里，远地点高度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圈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亿万中国人无不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这一喜讯。

5月1日劳动节这一天，自始至终关注卫星事业的毛泽东，专门抽时间接见了“东方红一号”卫星和运载火箭研制人员代表。

“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升空，使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第五个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拉开了中国人进军太空的序幕，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地位。1988年邓小平指出：“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研制和发射，是科技强国的一个光辉典范，其铸就的“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弥足珍贵，必须永远铭记和传承下去。

“不能超过老百姓的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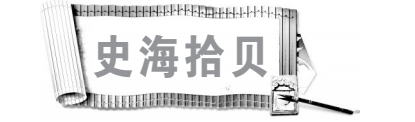
1957年，许光达90岁的父亲去世了，按照当地风俗习惯这是要隆重操办的丧事，况且还有个儿子在北京当大官，似乎更应该讲排场。为此，湖南老家的几个兄弟拍电报让他立即回去主持丧礼，并要带回供亲属做孝服用的白布。许光达对妻子说：“爹爹去世，我理应回去，尽尽做儿子的责任。可是，哥哥们要大搞排场，点名让我去主持丧礼，光是白布就要带回几十匹，这怎么行啊！中央号召移风易俗，只能从简办丧事。况且回去会惊动许多地方官员，一个共产党的司令，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为父亲送殓，这和国民党的官僚有何区别？不回去，从维护党的威信来讲是应该的，但亲人们会不理解。”左右为难后，许光达下定决心，派了一名熟悉湖南风土人情的政治干事带着200元钱，代他回乡料理丧事，并几次打电话给当地政府，要求他们不能铺张浪费，一定不能超过当地老百姓办理丧事的标准。果不其然，许光达的几个叔伯和兄弟对此不满，他们质问那名干事“许光达为什么不回来？”政治干事没办法，只好给许光达挂长途电话，但许光达在电话里告诉他：“继续做工作，按我原来说的办！”许光达的哥哥和亲属没有办法，只好从简办丧事安葬了老人。政治干事从湖南回来一报账，丧事共花费了150元。后来，许光达的母亲去世，家乡亲属再也没人提出额外要求了。

作为“十六字”方针的具体化形式，“三勤”政策使中共地下党在巩固党组织的前提下，做到积极隐蔽。

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在白区进行斗争，一没有政权，二没有武装，经费也很少，我们依靠什么？就是依靠正确的路线、坚定的信仰、严密的组织、严明的秘密工作纪律、灵活机智的战略战术和群众的拥护，以及朋友的帮助才取得胜利的”。

皖南事变后，联大地下党负责人马识途对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深有感触。他强调，“地下党因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工作，要取得斗争的胜利，必须尽力扩大同盟军，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更要抓统一战线工作”。

在“十六字”方针和“三勤”政策指引下，中共地下党人点点滴滴的统战工作终见成效。例如，1946年3月17日，昆明学联为“一二·一”运动四烈士举行出殡时，包括中间派师生在内的送葬队伍达20000多人。这个数字显示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方针政策，在中共地下党的统战实践中行之有效，使中国共产党最终赢得文化战线上的胜利。



许光达大将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叱咤风云，赫赫战功彪炳史册，在生活中忠于爱情、充满激情，与结发妻子邹靖华十年离别情不移的爱情故事，动人而浪漫。一份《降衔申请》，寥寥500字，却昭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美德。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毛泽东高扬起这份《降衔申请》，朗声赞道：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人情不能大于王法”

1960年，由于自然灾害，全国粮食减产。当时，军队的条件稍好一些，一些部队干部亲属从农村跑到部队长吃长住。装甲兵机关也有不少干部的亲属从四面八方拥进北京，在机关大院长吃长住。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许光达主持召开装甲兵司令部党委会议，作出一项决议：“困难期间，司令部机关的干部要动员亲属不要来北京；已经来的，要动员其尽快回去；凡是来探亲的，只允许住3天，就动员他们返回原籍。”没想到这个决议刚颁布没几天，许光达的四哥许德富和六弟许德强也来到北京投靠他。一石激起千层浪，装甲兵机关大院的干部和家属都瞪大了眼睛，注视着许光达。当天，劝回这件事由邹靖华向许德富、许德强两兄弟提了出来。许德富火了，他认为这地方就你许光达官最大，你不发话，谁敢要我们走？俩兄弟悄悄进了许光达家厨房，把橱柜一一打开查看了一番，看到家里确实没有多少东西吃，就问厨师：“他们平时就吃这些东西吗？”“实话跟你们说吧，首长家里也吃上了小球藻。”厨师指着门口一只水缸里养的绿乎乎的东西，“这就是家里养的小球藻”。许德富、许德强看着缸里的小球藻，非常惊讶，将军家里也吃上了替代食品，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俩兄弟最后仅在北京住了两天，就踏上了返乡的列车。事情发生后，有些人背后议论邹靖华，说这位嫂子不近“人情”。许光达知道后说：“不，她做得对。这是装甲兵部队党委刚作出的决定，是我让她这样做的。俗话说，人情不能大于王法啊。”

“不能超过老百姓的标准”

1957年，许光达90岁的父亲去世了，按照当地风俗习惯这是要隆重操办的丧事，况且还有个儿子在北京当大官，似乎更应该讲排场。为此，湖南老家的几个兄弟拍电报让他立即回去主持丧礼，并要带回供亲属做孝服用的白布。许光达对妻子说：“爹爹去世，我理应回去，尽尽做儿子的责任。可是，哥哥们要大搞排场，点名让我去主持丧礼，光是白布就要带回几十匹，这怎么行啊！中央号召移风易俗，只能从简办丧事。况且回去会惊动许多地方官员，一个共产党的司令，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为父亲送殓，这和国民党的官僚有何区别？不回去，从维护党的威信来讲是应该的，但亲人们会不理解。”左右为难后，许光达下定决心，派了一名熟悉湖南风土人情的政治干事带着200元钱，代他回乡料理丧事，并几次打电话给当地政府，要求他们不能铺张浪费，一定不能超过当地老百姓办理丧事的标准。果不其然，许光达的几个叔伯和兄弟对此不满，他们质问那名干事“许光达为什么不回来？”政治干事没办法，只好给许光达挂长途电话，但许光达在电话里告诉他：“继续做工作，按我原来说的办！”许光达的哥哥和亲属没有办法，只好从简办丧事安葬了老人。政治干事从湖南回来一报账，丧事共花费了150元。后来，许光达的母亲去世，家乡亲属再也没人提出额外要求了。

『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 陈银健

是娇惯放纵，而是严格要求。在许延滨很小的时候，一次，许光达下班回家，看见一群孩子在司令部大院吵嚷，相互比谁的爸爸官大，许延滨跑到他面前问：“爸爸，你的官大不大？”许光达平静地回答：“不大。爸爸的官小，只是个人民的勤务员。”这件事引起了许光达的警觉，为了严格管教孩子，他立下了三条规矩：一是孩子上学就住校，让其从小就过集体生活。二是严格控制孩子的零花钱，生活标准向工农子弟看齐。三是不准司机接送孩子，让他自己跑路。另外，他还严格警告许延滨，在外面不准打我的牌子。许延滨严守父训，从不对别人讲父亲是司令员。从上小学到上中学，他填表时只填母亲不填父亲。许延滨高中毕业了，因为他品学兼优，学校准备推荐他出国学习。可是，当审核其在学校填的各种表格时，发现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家长栏”里只有母亲的姓名，没有父亲的姓名。他的父亲是谁呢？会不会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不然，为什么要隐瞒？学校负责政审的同志来到许延滨家中，一方面想了解一下他父亲的情况，另一方面也想征求一下家长关于儿子出国学习的意见。学校的老师讲排场。为此，湖南老家的几个兄弟拍电报让他立即回去主持丧礼，并要带回供亲属做孝服用的白布。许光达对妻子说：“爹爹去世，我理应回去，尽尽做儿子的责任。可是，哥哥们要大搞排场，点名让我去主持丧礼，光是白布就要带回几十匹，这怎么行啊！中央号召移风易俗，只能从简办丧事。况且回去会惊动许多地方官员，一个共产党的司令，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为父亲送殓，这和国民党的官僚有何区别？不回去，从维护党的威信来讲是应该的，但亲人们会不理解。”左右为难后，许光达下定决心，派了一名熟悉湖南风土人情的政治干事带着200元钱，代他回乡料理丧事，并几次打电话给当地政府，要求他们不能铺张浪费，一定不能超过当地老百姓办理丧事的标准。果不其然，许光达的几个叔伯和兄弟对此不满，他们质问那名干事“许光达为什么不回来？”政治干事没办法，只好给许光达挂长途电话，但许光达在电话里告诉他：“继续做工作，按我原来说的办！”许光达的哥哥和亲属没有办法，只好从简办丧事安葬了老人。政治干事从湖南回来一报账，丧事共花费了150元。后来，许光达的母亲去世，家乡亲属再也没人提出额外要求了。

力劝妻子脱军装

1952年，中央决定军队的大批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装甲兵系统同其他系统一样，也要转业一批干部。根据邹靖华的情况，本可继续留在军队。可是，许光达却动员她响应党的号召，转业到地方工作。邹靖华一时难以接受：“军队是我成长的摇篮。我们的青春是从军队开始的，我们的革命道路是从军队起步的，我们的事业是在军队里建设的，怎么舍得离开呢？”听闻妻子的言语后，许光达劝道，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人啊。我是司令员，你应该带个头。你带了头，是为了我在干部面前说话更有号召力。邹靖华这位1938年参军的老战士，尽管心里难受，还是带头脱去了军装，转业到重工业部有色金属设计政治部工作。



靠“老子”吃饭是没有出息的

许光达对独生子许延滨十分疼爱。但是，他表达爱的方法不

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和“三勤”政策

□ 刘 宇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在上世纪40年代初，为积蓄革命的有生力量，争取更广泛的中间力量的支持，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中共地下党先后制定了“十六字”方针和“三勤”政策。中共地下党的统战工作围绕此方针政策展开，最终取得第二条战线上的胜利。

毛泽东制定的“十六字”方针

1939年1月13日，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南方局将统战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由周恩来亲自负责。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并且强调，“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用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该指示可概括为对外做好统战工作，对内做好党建工作，“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在此之前，地下党的工作方法是发展党员，建立广泛的基层党组织。该方针在党内传达后，地方党组织及时调整策略，停止发展党员，取消小组，改为单线联系。“十六字”方针使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发生巨大转变。

在皖南事变后的白色恐怖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贯彻“十六字”方针，保障了中共地下组织的安全，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在1941—1945年间，地下党人长期隐蔽在群众中，广交朋友。他们以公开的职业（比如教师、职员）为掩护，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做统战工作。

周恩来制定的“三勤”政策

周恩来于1941年初提出“三勤”政策，即勤学、勤业、勤交友，要求地下党人勤于学习、精通业务、广交朋友。其中，勤学和勤业是勤交友的前提条件，而勤交友既是勤学和勤业的目的，也是隐蔽精干的保障。

首先是勤于学习。以西南联大地下党为例，联大地下党人的学习成绩普遍十分优异。校园里，地下党人要想赢得师长和同学们的尊重和好感，首先需要学习成绩优异并乐于助人。

其次是勤于业务。联大地下党人的业务能力很强，如组织同学们排演抗日救亡戏剧，还到云南的偏远山区做统战工作，在那里的学校教书，建立地下党的中小学据点，为革命播撒火种。

再次是广交朋友。地下党人积极为同学们办实事。例如，上世纪40年代时物价飞涨，联大学生的伙食很差。于是，联大地下党人齐亮主动挑起办好膳团的责任，“到外县去买物美价廉的米和菜，让同学们吃饱，深受群众的赞扬”。

毛泽东明确指示，“应该广泛地展

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联大地下党人在赢得同学们的好感和尊重后，“广交朋友”自然水到渠成。

联大地下党人“勤交友”取得成效，其个人魅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1942年考入联大的学生胡邦定忆述：联大地下党人马识途、李晓和张彦，功课好又乐于助人，因此得到同学们的拥护。他们搞社团和进步活动很忙，于是有些同学“出于对好人的同情，就叫我帮你做点事，这样子就跟着走向革命了”。

周恩来指出：由南方局各组 and 云南党的实践可见，该政策“在推动和领导抗战后期民主高潮上起了很大作用”。

这主要是指，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民主运动高潮到来时，南方局和云南省工委领导下的联大地下党，邀请教授演讲，策划组织学生集会，向国民党要民主。中间派师生踊跃参加，“由几十上百人，数百人以至数千人，最后席卷全市中等以上学校师生几万人卷入民主运动的洪流”。“三勤”政策经过革命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

“十六字”方针和“三勤”政策的成效

自上世纪40年代初起，中共地下党的方针政策主要聚焦于两点：一是将统战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争取中间力量的支持，同时孤立和打击国民党中反共的顽固派。二是巩固党组织，加强党性教育，做好党建工作和秘密工作。

以联大地下党为例，在“十六字”